

挑战与回应

——新时期妇女研究讲学录

李小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挑战与回应

——新时期妇女研究讲学录

李小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挑战与回应

——新时期妇女研究讲学录

李小江 著、责任编辑 陈智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郑州粮食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366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15-03662-6/G·521 定价:19.00元

前言

这一本书是集体智慧与合作的结晶。

讲学与访谈，都不是坐在书斋里独善其身能够完成的。讲，必得有听众。为此，我感谢海外诸多大学和组**织**给我提供了讲坛，更感谢众多的听众，热心和耐心听**讲**，并且提出了许多问题，不断激活我的思维。座谈、论坛和访谈，有时是在一个专题下的众口交议，也有时被一个人追问得海阔天空。

自 90 年代以来，我曾受到加拿大、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数十所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邀请，在海外参加论坛或演讲近百场，主题大多围绕着中国妇女研究、妇女运动、妇女问题、妇女组织、妇女学科建设和妇女文化现象。这里能够记录下来的，是因为碰巧做了录音——根据这些原始录音资料所做的笔录，将真实的情境再现于此，有两个目的：一是传递信息。我愿以我个人的经历为窗口，将八面来风带给我在国内的诸多朋友。二是校正视听。近几年来，有关我在海外的讲学访问活动，国外新闻界和国内政界有报道也有“内部资料”传阅，多见谬误与讹传；这里记录下来的应该是更接近真实的声音。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10 余年来与我风雨同舟、苦甘与共的挚友、同事兼助手梁军女士和我周围诸多的合作者朋友，没有他们的敦促和群体协作，这本书也许永远不会问世。为了清理这数百个

小时的录音磁带,许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数十天:黄燕副教授承担了几近全部英语录音资料的翻译和整理,董琳女士、许孔玲女士和冯凌琴副教授主要承担了讲演中的中文(和部分英语)资料的整理工作,我的妹妹李南南主要承担了采访录音资料的整理,梁军副教授负责全部录音稿的审查编撰。还有10余年来像兄长一样呵护我的马牧先生,废寝忘食,将全部手稿打印成册,自始至终与我分享“挑战与回应”的压力和快乐——均一并在此奉上我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李小江

1996年春节前夕于郑州

目 录

前言	(1)
代序:与海外朋友谈中国妇女	(1)

(一)讲学与答疑

公共空间的创造	(1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 中国研究中心(1991. 10. 5)	
中、西方妇女及妇女研究者的比较	(18)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人类学系(1991. 10. 8)	
中国当代妇女文学的发展	(27)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1991. 10. 21)	
妇女问题与中国当代妇女研究	(43)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91. 10. 24)	
为什么筹建妇女博物馆?	(54)
加拿大蒙特利尔康可迪亚大学西蒙娜·德·波娃 学院(1991. 10. 26)	
关于“中国妇女研究”的课堂答疑	(60)
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东亚系(1991. 12. 2)	
妇女文化与妇女研究方法	(71)

丹麦阿胡斯大学妇女研究中心(1991. 12. 6)	
80 年代中国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	(74)
德国基尔大学汉学院(1991. 12. 7)	
80 年代中国社会改革中的妇女问题	(84)
德国海德堡大学人文学院(1991. 12. 12)	
妇女研究在中国	(94)
德国海德堡大学人文学院(1991. 12. 14)	
社会主义与中国妇女	(107)
德国东柏林洪堡大学汉学院(1991. 12. 18)	
妇女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26)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1991. 12. 19)	
以妇女研究推动妇女的发展	(134)
墨西哥国家研究院亚非研究中心(1992. 1. 25)	
改革中的中国妇女问题	(137)
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1992. 2. 3)	
中国妇女解放的得与失	(14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妇女研究中心(1992. 2. 10)	
关于'95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53)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研究院(1994. 3. 30)	
新时期妇女运动回顾	(161)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94. 3. 30)	
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生成与发展	(171)
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亚洲文化研究 中心(1994. 8. 1)	
《秋菊打官司》放映前的现场演讲	(176)
德国慕尼黑市政厅影剧院(1995. 1. 13)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与妇女运动·····	(177)
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学院(1995. 1. 17)	
接受“国际妇女先驱”荣誉称号时的即席演讲·····	(180)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1995. 3. 9)	
再谈公共空间的创造·····	(181)
英国伦敦英中文化交流中心(1995. 7. 13)	

(二)论坛与座谈

“莱思宾”(女同性恋者)聚餐会·····	(192)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莱思宾”之家(1991. 11. 23)	
与日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座谈·····	(208)
日本东京市立档案馆(1994. 8. 2)	
座谈:关于日本家庭和家庭主妇·····	(223)
日本北九州市国际会议厅(1994. 8. 9)	
座谈:德国妇女与妇女运动·····	(234)
德国慕尼黑市政府文化部会议室(1995. 1. 11)	
论坛:“亚洲——妇女”圆桌会议·····	(240)
德国慕尼黑市音乐厅(1995. 1. 12)	
关于(德国)家庭的讨论·····	(246)
德国慕尼黑市巴伐利亚电台记者尤塔家(1995. 1. 14)	
论坛:“半边天”有时也是地狱吗?·····	(252)
德国法兰克福市妇女活动中心(1995. 1. 19)	
座谈:“剑桥新语”话妇女·····	(257)
美国哈佛大学“剑桥新语”社(赵汝兰教授家 1995. 2. 24)	

(三) 记者采访

新华社《瞭望》杂志记者采访(1990. 3. 22)	(261)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1993. 2. 10)	(276)
答河南《文化艺术报》记者问(1993. 2. 16)	(288)
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采访(1994. 3. 28)	(298)
香港《明报》驻多伦多记者采访(1994. 3. 29)	(304)
英国华人杂志《中国人》采访(一)(1994. 7. 10)	(313)
英国华人杂志《中国人》采访(二)(1994. 7. 12)	(332)
德国《南德日报》记者采访(1995. 1. 10)	(353)
德国“德新社”记者采访(1995. 1. 11)	(356)
德国巴伐利亚电台“记录本”专栏记者采访(1995. 1. 14) ...	(360)
德国中德电台记者采访(1995. 1. 14)	(363)
德国黑森电台记者采访(1995. 1. 20)	(366)
法国“黄河艺术协会”采访(1995. 4. 21)	(370)

(四) 专题访问

“让她们自己能做选择”	(387)
访丹麦阿胡斯市“母亲之家”(1991. 12. 5)	
“在这个地方做女人很舒服”	(393)
访丹麦阿胡斯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1991. 12. 5)	
“如果你是上帝还差不多,可你又不是”	(399)
访德国柏林市妇女活动中心(1991. 12. 17)	
“在夹缝中间周旋”	(411)

- 访美国东北大学国际教育部主任卡特博士(1992. 2. 5)
- “为了寻求平等和平静!” (416)
- 访日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葛目至女士(1994. 7. 31)
- “保护环境是我的哲学!” (428)
- 日本北九州妇女与环境保护(1994. 8. 9)
- “看看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430)
- 访德国“为了家庭”协会原主席沃尔特
女士(1995. 1. 13)
- “为了和平!” (437)
- 访德国科布伦茨市胡斯女士(1995. 1. 18)
- “试一试看吧,为了自由!” (446)
- 访原东德教授朱利特·乌尔法女士(1995. 1. 19)
- “在同一世界中” (457)
- 访歌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克里斯蒂娜
女士(1995. 1. 20)
- “我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 (461)
- 访美国纽约长岛大学卡普兰
博士(1995. 7. 18)

代序：与海外朋友谈中国妇女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与海外朋友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妇女。

真要谈中国妇女，可得小心。内内外外总有两个陷阱，一不留神就掉进去了。

对外讲中国妇女，你得先讲清自己的地域身份：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最早提醒我对这一称谓警惕的，是在台湾刮过一阵旋风、现已定居德国的女作家龙应台。在法兰克福附近一个住着德国商界显贵的小镇上，生活是那样安逸舒适，她却怀着一颗并不平静的心，忿忿不满地对我说：“现在在海外，一说中国作家就是大陆作家，台湾作家的地位在哪里？”我由此联想到了中国妇女。

在美国时，一位先生告诉我他的感受：“可不要笼统地讲什么中国妇女，差别实在太大了。”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使我忍俊不禁。“当我，一个男人，突然闯入中国女人举办的 party（聚会），不用你介绍，我立刻能分辨出何人来自何方。说话声音最响、大大方方与你打招呼的，肯定来自大陆。说话变了声音，拿腔拿调的，一定来自台湾。默默看着你不作声的，就是香港女人了。”

无论这位先生的判断是否准确，日后可是让我琢磨了许久。因为，对大陆、台湾、香港妇女之间的差异，我自己也深有感触。但却是从女人的角度，在女人中间。

1990年，我们这里主办“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国际研

讨会，台湾和香港的女界朋友们首次在大陆作正式的学术交流。席间，来自台湾的女性，哪怕就是教授学者，举止言行大多锋芒毕露，富于战斗性。大陆的女性们，即使是来自基层的，也如同学者一样，对异性对自己大多温和而大度。默默坐在那里不多说话的，也真的就是来自香港的朋友。

这当然都是一些太表面的看法。但是，从这些角度切入，从我们对男性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中，也反映出中国妇女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男女相处的基本态度和男女平等的不同程度。个中甘苦得失，得有人去做专门的文章娓娓道出。

那么，对内呢？对内似乎不会产生太大的误解，说中国妇女也就是说大陆妇女。但这里却也有一个陷阱更得留神，即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农民？工人？抑或知识分子？其间差别不只是表面的，在基本性质上也判若天壤。

首次赴加拿大访问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海外学者有一个座谈会，问得最多的是：“当前最大的中国妇女问题是什么？”我一向不耐烦人们把“妇女”和“问题”联在一起，更何况是我们女人自己。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厌倦，还不待我回答，就有一位加拿大学者提醒我：“我敢保证，这将是你在国外遇到的最多的问题。”

怪的是，在国外，竟很少有人这样提问，反倒是我自己终于耐不住了，主动去问华盛顿大学的罗斯教授：“为什么你不提这个问题？”她笑着说：“我也想问，可我担心你会用同样的问题反问我。你知道，美国妇女差别那么大，黑人妇女，白人妇女，白领的，蓝领的……几句话怎么讲得清楚？”

多民族、多种族的美国妇女差别很大，何以见得黄皮肤的中

国妇女就是铁板一块呢？但是，真的很遗憾，长时间以来，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语言和服装，千万人一张面孔、一种声音，而且一准是最贫困、最落后、最多子女、最多苦难的女人的面孔和声音。因此，本世纪初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三寸金莲”，也可作一叶障目，反倒是地道的老外们看了中国妇女的大脚见怪。

遗憾的是，这种倾向也反映在西方妇女学界，一个时期一种腔调，在西方妇女自身发展的背景下看中国妇女，无论出于尊重还是出自同情，却总是不尽人意地生出了两个有关中国妇女的“神话”。

第一个“神话”，有关 50 年代的“中国妇女解放”，以西蒙娜·德·波娃的《长征》等著作为代表。当时，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妇女走回家庭，性别角色回归传统，在“女性的困惑”中探索重新确认自身价值的出路。与此同时，中国妇女走上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空前广泛的社会参与世所瞩目。一时，西方妇女在自己的困境中把中国妇女当作“解放”的偶像。

80 年代，在长达 20 多年的封闭后，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国门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改革中涌现出许多妇女问题。而西方妇女已经经历了 60 年代新女权运动的洗礼，再看中国妇女，很快就破了 50 年代的“解放神话”，同时却又制造了一个新的神话，我称之为“双重压迫神话”，即中国妇女处境不仅没有什么进步，甚至比 40 年前更糟糕：她们不仅仍然受着传统家庭的束缚，而且又受到国家和政治的干扰和压迫。

1991 年我在国外时，深深感到这个新的神话气氛已经弥漫在

整个西方社会中，带着浓浓的政治偏见，造成了我们与西方妇女、妇女学者之间相互理解、对话、交流的困难。“西方中心”以及“第一世界”的话语和心态，也同样存在于具有共同的“第二性”的历史体验的妇女之间，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当时，西方与东方的抵牾，政治民主与经济贫困问题，还有民族和种族的隔绝，诸多误解之中，我的回答是：沉默。

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白梅博士最早鼓励我打破沉默。当我只是私下里抱怨西方的误解时，她近乎恼怒地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别人给你正确的解释呢？你们应该自己说话。”

她说得对。我们必须自己说话，尔后才会有平等的对话。

1991年秋天，应邀参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年会，我终于打破了沉默，做了“中、西妇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讲演。站在人类学系小会议厅的讲台上，我觉得自己那么自信、坚强、美丽，仿佛是在现身说法。我说：“如果说40年来中国妇女的情况比过去更糟，怎样解释城镇妇女如此广泛的社会参与程度？怎样解释农村妇女的生活变化和在农村改革中正在发挥的巨大作用？怎样解释中国妇女研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和妇女的广泛认同？怎样解释中国留学生中如此众多的出色的女留学生？怎样解释我会站在这里、如此自信的发言？

我当然很清楚，对中国妇女苦难的同情、对其苦难形象的塑造乃至偏见，也许也是出自西方的传统，不仅是对中国妇女。摩洛哥的萨依达博士看过我在非洲拍摄的照片后，激动地对我说：“我第一次在一个外国人这里感到我们非洲这么美，非洲妇女这么美。”她提醒了我。回想起来，我并没有有意去拍美的，但也没有着意去拍丑的。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丑陋，怪不得别人的眼睛，

丢人现眼，当然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一则是因为曾经把女人束缚到死的传统家庭；二则是因为落后贫困的经济状态；但更多的，还是政治影响。

1989年底在香港参加“华人社会性别研究”研讨会，针对“中国妇女问题”日益引人注目以及由此导致的“妇女地位问题”，我提出当代中国妇女现状分层研究理论，特别强调了不同阶层妇女之间的社会差异，以及中国（大陆）知识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平等权利这一事实。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律师毫不留情地问我：“大陆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还有什么女权啊？”我最害怕这种抽象的人权概念。倒不是怕锒铛入狱做了大英雄，而是唯恐使用不当亵渎了神圣。

“想想吧，那里生活着5亿多妇女。”我说。

一个数字使四座都沉默了，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我不敢说，这庞大惊人的数字就是我自信的根据；我也不敢说，有这许多妇女就意味着有了许多人权女权。我只确信，在人们称作“大陆”的那块土地上，今天至少有5亿妇女在那里生活着养育着劳作着。她们有痛苦，也有欢乐。“你知道她们会哭，”我问：“可你知道她们会笑吗？像我们一样大笑。坦白地讲，只是在她们中间，我才笑得最开心。如果只是痛苦，只是压抑，只是血淋淋的，她们早就死绝了——可是，她们活着！”

这样的事发生在1989年底，情有可原。事过几年之后依然。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会定格在他印象中最深的历史时刻。或许也像我们，一说美国妇女，就定格在“性解放”；一说非洲妇女儿童，一准是在饥饿中挣扎，骨瘦如柴。

1993年秋天，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坐在非洲的“哈佛”马卡里尔大学贵宾园的草坪上，静静地看着狂欢中的人们——每天

晚上，与会的妇女们都在这里跳舞狂欢。非洲妇女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激昂欢快的非洲鼓声中，显得那么自信，那么快乐，那么强健，高喊着“*Africa, Waya Waya!*”（加纳语：非洲，向前，向前）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非洲妇女。

一位白肤色的中年妇女悄然在我身边坐下，她问我来自何方。

“中国。”我说。

“哦，中国！”她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好心的说：“我很同情你们。”

这回是我吃惊了：“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你们承受着那么大的压力：家庭，还有国家。”这是一位来自罗得西亚的荷兰籍教授。

让人同情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说了一句：“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去看看吧。”因为，也正是在这里，在这非洲的土地上，才永远地扭转了我心中的非洲妇女形象。

那么，非洲黑人又怎样看中国妇女？

我去了英联邦乌干达，在乡村土屋前与同一个丈夫的三个妻子谈心；也去了前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与守护中国体育场的宪兵们聊天。坦白地说，非洲妇女比非洲的男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少，正像她们在我们的视野里，长期以来也是盲区。

在黑非洲的土地上普遍盛行的一夫多妻、多子女，与中国社会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计划生育，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本应有许多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可以交流的体验。但是，不知是因为语言还是历史的原因，非洲妇女更自然地与欧洲妇女接近。而对我们，除了礼貌，更多的是由于相互间的无知而造成的疏远。

相比之下，热情而友好的反倒是非洲男人。漫步在达喀尔的

海滩，总有人向你走来，微笑着向你问好，或伸出手来与你相握。好几次，他们一个或两三个地陪我一同散步，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当我告诉他们，他们总会用蹩脚的英语回答：“I love Chinese women!”（我喜欢中国妇女）为此，我问过一位达喀尔大学法律系毕业、现在一家中国公司做经理助理的先生。他说他要娶一个中国女人做妻子。

“可是，中国女人不允许一夫多妻，你干吗？”我问。

“如果我去中国，就……”

“如果回来呢？”

回答我的是朗朗的笑声。我明白这意味。我的一位远嫁到这里来的朋友更明白这笑声的意味。笑声中有女人的泪水。可是，当我问到几位先生，为什么喜欢中国女人，回答竟让我大吃一惊：“毛泽东！”

在非洲，“毛泽东”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中国妇女形象也因此高大了许多。还有，在东欧，在前苏联，原本是中国应该称作“老大哥”或“老大姐”的地方，如今对中国妇女也另眼相看。

尼罗河源头的绿树荫下，与来自战乱中的南斯拉夫女教师合影留念，她抚着我的双肩，用极生硬的英语向我说了两个字：“China, Peace.”（中国，和平）我的眼睛湿润了，因为我正在编写“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中的《战争与女人》，太知道这Peace（和平）的代价，对曾经历过战争的中国女人和今天的南斯拉夫妇女意味着什么。

在原是东德的最高学府洪堡大学，十几位教授和我一起讨论“妇女”。原东德妇女正在日益“失去”：失去工作，失去福利，失去男女平等的社会保障。她们因此关心改革中的中国妇女。“有同样的问题吗？”“我们该怎么办？”——这时，我注意到，米勒教授